

六十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宗教革新运动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文 晓 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不甘忍受剥削压迫，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争取独立、民主的解放运动新高潮。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由于各自的国情不同而走着不同的道路，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点，即：不发达地区人民的解放斗争往往或远或近地与宗教相联系着，一方面，革命形势迫使宗教卷入政治旋涡；另一方面，宗教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动员群众的手段，群众的革命要求在宗教革新运动中得到了某些反映。6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天主教会的革新运动就是拉美民族民主革命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从其实践活动与理论思想中，可以了解到当代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一个侧面。

(一)

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宗教革新运动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也有光荣的历史传统。

社会原因之一是，拉美参加解放运动的绝大多数人民都是天主教徒。他们的革命斗争与宗教意识必然互相发生影响，必然力图革新宗教为革命斗争服务。正如尼加拉瓜执政委员会丹尼尔·奥尔特所说：“个人既可以是教徒，又可以是革命者，两者之间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

拉丁美洲信仰天主教的人数之多与殖民统治有关。在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居民主要信奉的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原始宗教。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殖民主义者纷纷来到美洲，他们一手舞剑，一手托着《圣经》，强迫印第安人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宗教作为维护殖民统治的思想保证。到目前为止，拉丁美洲已成为世界上天主教徒最集中的地区，在三亿二千万居民中，天主教徒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拉美天主教徒占世界天主教徒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正因为天主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往往会通过教会改革，异教运动的折光反映出来。

社会原因之二是，战后拉美的政治斗争形势迫使教会面对社会斗争，促使了教会的内部分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首先主要是反对美帝及其代理人的斗争。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各国除了经济剥削外，还常常利用各种反动势力，策动军事政变，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各种集团，在工运中制造分裂，运用泛美机构等政治手段进行干涉。因此，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不但要求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且要求政治、军事和外交上摆脱美国的控制，广泛组织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斗争，爆发了

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与武装斗争。这一时期拉美政治形象的另一个特点是，各国军事政变频繁，军人政权林立。到70年代，南美10个国家中有8个，中美6个国家中有5个都是由军人直接统治。在独裁的军人统治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任何保证。因而，反对军人独裁，争取民主权利就成了拉美解放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在独裁政府中能够公开出面谴责政府侵犯人权的机构只剩下了教会，所以天主教会在拉美各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拉美天主教会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分化为三个派别，其激进派的社会改革主张与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方向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宗教革新运动并行的特殊历史现象。

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参与政治活动，也是有着历史传统的，它不象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在殖民统治时期，反动的天主教会就与政府、大庄园主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统治人民达数百年之久。而一些中、下层神职人员则曾和人民站在一起，反抗殖民统治和专制制度，最著名的是1810年墨西哥的伊达尔戈神父及莫列罗斯神父领导的起义，这一斗争直接推动了墨西哥的独立。

二十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开始缓慢发展。占有大量土地并享有种种特权的教会，直接妨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矛盾往往酿成全国规模的政治斗争乃至国际斗争。教会内部某些较开明的宗教人士开始停止对保守党的支持。60年代后期，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对教会的支持也大大下降，发生了威胁教会生存的宗教危机。教会被迫转向穷苦大众，争取他们的支持。一部分神职人员和神学家开始对拉美天主教会的社会政策提出疑问，探索造成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不发达的原因，产生了一系列宗教和社会方面的新见解。一般教会人士也都感到有必要以新的态度来进行传教和社会政治活动。还有一些神职人员甚至直接参加了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例如，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以后，支持桑地诺的神职人员创立了“人民教会”，其中五名神职人员还参加了桑地诺政府。在1979年召开的第三届拉美主教会议上，与会者不顾罗马教皇一再阻止神职人员参政的要求，而指出：拉丁美洲天主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为了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军人统治、贪污腐化以及社会不公平，进行了二百多年的英勇斗争。因此，神职人员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斗争，为反对独裁和争取实现社会改革而斗争。

在国际上，从五十年代起，社会主义成为最大的社会历史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遍及五大洲。在拉丁美洲出现了智利的“阿连德社会主义”，圭亚那的“合作社社会主义”和秘鲁等国的“军事社会主义”等。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影响到教会，天主教会中的激进人士就试图以社会科学中的新成就来剖析社会现实，并感到有必要把社会科学同神学结合起来，以便从一种新的神学立场来回答教徒和世俗群众对拉美社会现实提出的质疑。

(二)

拉丁美洲天主教会的革新运动在实践上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在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中分化出革新派和激进派。

过去，拉丁美洲天主教会是一个特权的堡垒，它一直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教会所从事的活动，主要限于社会福利和慈善救济事业。60年代以来，拉美社会动荡不安，反对独裁统治，要求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迫使教会顺应历史进程，作出相应的变革。在积极参加政

斗争的过程中，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分化为保守派、革新派和激进派。这一分化是以1968年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召开的拉丁美洲第二届主教会议为标志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是天主教会内部讨论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代表大会。麦德林大会对十多年来教会从事的社会政治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会上，进步神学家阐述了“解放神学”的思想。会议的文件上公然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暴力的制度，是金钱上的国际帝国主义。它号召教会与穷苦人民同甘共苦。

保守派主要由教会上层人士组成，他们力图维护旧的统治秩序，支持独裁统治，反对实现“宪法化”，他们还与政府一道，在许多地方成立“保卫传统、家庭和财产协会”，阻挠社会变革。保守派至今在多数国家中仍然控制着实权。

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中下层僧侣，他们赞成社会改革和教会改革，但是反对暴力革命。他们既不满军事独裁，又怕受到“解放神学”的影响，去搞太多的政治活动降低宗教的超然地位。

激进派都是同情或实际参加改革斗争的中下层神职人员和教徒，他们主张彻底改革，反帝、反独裁的政治态度坚决，其左翼甚至自称信仰社会主义，主张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斗争。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他牺牲后，1968年召开了“拉美卡米洛·托雷斯大会”，会议号召拉丁美洲基督徒“积极地 and 紧急地参加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同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者团结起来，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我们的一点微小贡献。”

第二，支持和参加武装斗争。

在拉丁美洲，由于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特别深，由于长期以来盛行独裁者的恐怖统治，由于人民被剥夺了民主的权利，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二次大战后，卷入武装冲突的拉美国家有十一国，发动成功的军事政变有39次。难怪英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巴纳比说：“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战争的中心。”五、六十年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又使拉丁美洲出现了“游击中心”运动，各国人民反独裁统治和超级大国、新老殖民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斗争日益壮大。

教会中的激进派坚决支持人民的武装斗争。一些左翼分子还直接参与了人民的武装斗争。例如：哥伦比亚天主教多明我会的教士C·多列斯，当他认识到宗教信仰必须体现在改革非正义社会的行动中之后，于1965年10月参加了反政府的游击队，1966年在一次遭遇战中牺牲。激进派代表人物卡米洛·托雷斯自1965年认识到合法斗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后，便拿起武器参加了游击队，于1966年2月15日阵亡，被拉美人民誉为“革命神父”。他的死促使越来越多的神父和修女参加了游击队。还有一些神职人员因支持正义的武装斗争而惨遭杀害，以萨尔瓦多为例，继120名神父被杀之后，1980年3月大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也因同情反政府的游击战而遭到右派恐怖组织的杀害。

第三，加强教会群众的组织工作。

近十年来，许多主教抛弃了他们居住的宅邸和庄园，到贫苦人民中去安家落户。各派势力都非常注意组织工作，教会主办的工会、农会、商会、妇女团体和学生团体，是他们控制和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例如：基督教民主党领导的拉美工会组织“拉丁美洲劳工中心”，是“世界劳工联盟”在拉丁美洲的分支机构，1964年有五百万会员，在一些国家势力很大，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它力促教会上层改变对待工人革命运动的策略；鼓励各级神职人员“同工人、农民一切被压迫者共命运。”再如：哥伦比亚教会主教会议的“社

会与农民事务委员会”同耶蘇会的“研究与社会活动中心”控制着全国农场工人联合会、全国合作总社和全国工人联合会。近年来，由于农场工人反对农场主、种植园主垄断土地和残酷剥削的斗争日益高涨，它经常组织农场工人进行“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农民中有一定影响。天主教会中的激进组织更是名目繁多，如：哥伦比亚的“戈尔康达小组”、秘鲁的“全国社会情报中心”、阿根廷的“第三世界神父”、智利的“青年教会”等。有一种叫做基督徒基层社团的组织，将宗教活动与民政事务联系在一起，成为农民联盟、工会、母亲会、棚户居民会的基层组织。过去十年来，这种基层社团已经发展到15万个，大大鼓舞了群众，消除了失败主义的低沉情绪，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拉丁美洲天主教会革新运动的代表思想是“解放神学”，它从理论上反映了进步宗教人士的变革思想。“解放神学”在当今拉丁美洲有很大影响，被誉为第三世界对神学的重大贡献，它打破了欧洲传统神学在基督教会中的垄断地位，激励着第三世界的信徒和神学家去创立适合各自情况的神学体系。

所谓“解放神学”，就是将宗教信仰和社会政治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其要点在于有意识地将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建立在现代拉丁美洲的特殊实践经验之上。1964年，一些革新派神学家在巴西召开会议，提出神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应该是现实，这次会议为“解放神学”的诞生开辟了道路。1965—1966年，还举行过多次这样的会议，逐步扩大了影响。1968年召开的麦德林会议标志着“解放神学”的诞生，随后，它在拉丁美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72年以来是“解放神学”的发展阶段，不仅一批新的神学家加入了这个行列，而且它所探讨的范围和内容更加广泛了。

“解放神学”虽然是一个统一的神学运动，但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其中，从革命团体的实践出发的神学流派最为激进，他们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拉丁美洲现实（但不接受无神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神学思潮。还有一种从历史实践出发的神学流派，他们强调救赎的历史与世俗的人类压迫及解放的历史的统一，主张建立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神学理论，以便在信仰的指导下，阐明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的解放中出现的神学理论。这里，我们从掌握的有限几篇译文中，择其与解放运动联系密切的观点作一介绍，从中可以了解到拉美宗教革新运动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某些关系。

首先，“解放神学”强调宗教的研究对象是实践。“基督教最首要的东西是仁慈，是行动……重要的不是接受信仰，而是实践。为了使神学既包括说教和信仰，又包括行为，它改变了神学的研究对象。”^①教会“是具有双重使命的组织。实现普世团结的使命和解放被压迫者的使命。要完成这种双重的历史使命，必须从现实的分歧、冲突和压迫出发，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充当解救人的上帝的见证人，来予告来世和解的特征。”^②那么，教会应当做些什么呢？教会的行动表现在哪里呢？“麦德林会议用一句话作了回答，解放人们。至于解放这一概念的内容，那是非常广阔的。应该在所有的方面和所有的领域中解放人们：使他们从罪恶的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从精神枷锁、恐惧、不安、陈规、惰性、冲动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从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从今天压在大多数人身上，而且也压在统治者本人身上的统治制度中解放出来；从作为当代世界统治制度的根源的经济制度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拉丁美洲基督教思想的思考、思维和研究对象。”^③由此可见，“解放神学”研究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现实的社会斗争；它把教会改革和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更着眼于社会改革；它不仅主张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而且主张把人们从当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

度中解放出来。

其次，“解放神学”阐述了革命的基本观点。概括地说，它主要包含三个内容：“1. 从政治角度讲，就是要使被压迫人民摆脱压迫阶级的统治；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就是要建立‘符合人性’的‘新型社会’；3，从基督教‘救世论’的角度讲，就是要使人类在同耶稣基督相对峙的过程中‘改造’自己”。④

《阶级斗争和福音》的作者则从基督教信仰出发，进行了政治分析，这个政治分析直接逻辑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据《圣经》规定，实行正义，有效地帮助穷人和解放被压迫者，是爱人的基本要求和真正宗教的试金石（大前提）。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中，我们同类人的大多数遭受贫困和压迫，这不仅是人们的无知和自私造成的，而且也是现行的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小前提）。因此，在我们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爱人本身就是要求我们为取代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努力（第一个结论）。另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真正改变生产关系，消灭集体剥削和阶级社会，将是社会主义的模式（第二个结论）。最后，由于现行秩序的牢固性和特权阶层的极力反抗，要取代现行制度，只有加强被压迫者的力量以对抗统治阶级政权（阶级斗争）并战胜这种政权，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第三个小前提），因此，在我们今天的具体环境中，基督教的仁爱驱使我们沿着动员人民和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第三个结论）”，文章进一步指出了革命的目标，是“用一种平等和团结的社会制度代替当前的剥削制度”，并且，在确立了新的制度之后，继续进行彻底的洗涤和新的创造。当然，对基督徒来说“这一点，我们只能指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只有在基督王国普及全球之日，我们才能指望达到这一点。”②

“解放神学”的代言人很坦率地承认它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承认二者有近似之处。他们认为，这种近似的基础在于，二者都不是僵死的教条，都是立足于现实的经验进行批判的分析，对历史的发展持探索的态度。具体地说，这种近似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同基督教的传统是一致的。因为，由教会的社会学说培育的这种传统，强调一切人的价值和他们的基本的平等权利。……实行仁爱，就是要共享福利和使人们共同向上。……人们把集体贫困看成是国内和国际上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结构中，富有者通过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获得了财富和权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时，就把贫困解释为这样的依附关系。这种解释已经为各国的技术机构所证实，同时，大体上也被教会的社会学说所接受。按这种解释，就应该这样来理解基督教的仁爱：它也应该体现为一种旨在使现行社会经济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政治责任。”④其次，这种近似还表现在二者的革命目标具有变通性，“基督徒所希望的来世王国，不仅在范围和内容方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来世说的共产主义大同，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和革命斗争也具有不同的作用。……虽然基督教的来世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来世说各有不同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把两者看成是对立的或不可并存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总可以被引向未来上帝的最高王国。”②再次，它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斗争途径的基本观点，但又进行了两点补充：第一点，“现实的人超越任何现在或未来的，宗教和政治的组织和纲领。”，因为上帝的思想首先体现在具体人身上，而不是首先体现在任何东西、组织和制度上面，也不是首先体现任何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分野上。第二点，“真理和正义比任何阶级的或时代的利益都更加紧迫”，它指出：“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阶级斗争规定的两个阶段。对于这两个阶段，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上述两点保留。然而必

须指出，这些要求至今一直为社会主义的和教会的运动和组 织所忽视”⑤。

我们从拉丁美洲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实际活动和代表思想中，可以得出它是现代拉美解放运动潮流的组成部分的结论。这种结合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它将成为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一个不可忽轻的特点。

参 考 文 章

- ①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形成与发展》吕臣重（《世界宗教资料》84.3）
- ② 《阶级斗争和福音》[智利]罗纳尔多·穆奥尼斯（《拉丁美洲神学概貌》1975年西班牙萨拉曼卡《西格麦》出版社）
- ③ 《拉丁美洲基督教思想中的“解放问题”》[比利时]约瑟夫·孔普林（同②）
- ④ 《六十年代以来拉美天主教会的变化》吕臣重（《世界宗教资料》）
- ⑤ 《拉美天主教的社会活动》刘猛昌（《国外社会科学》81.4）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

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召开理事扩大会议 讨论和布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问题

1985年11月底，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召开理事扩大会议，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题，讨论了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对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关系，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政策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改革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特别强调落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的重大意义。这次理事扩大会议还确定明年学会的工作将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要求全体会员在认真学习党中央有关文件的同时，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多举办小型讨论会、研究会，提高召开学会年会的质 量。1986年学会年会将编印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论文集，并评选出84—85年度的优秀论文。

（省科社学会秘书处）